

重庆高山纳凉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评价指标模型

田翠翠 刘黎黎 田世政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 重庆 400715)

【摘要】 重庆将避暑刚需与旅游扶贫结合, 开创了高山纳凉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该项目实施已近5年, 是国内旅游精准扶贫的先行者。以高山纳凉村旅游精准扶贫为研究对象, 利用AHP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以贫困户个体、贫困家庭、纳凉村社区3个层面25个测评指标的旅游精准扶贫效应评价指标体系, 提出以模糊综合评价法为基础的效应指数计量模型, 为后续的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奠定基础。

【关键词】 重庆高山纳凉村; 旅游精准扶贫; 效应评价

【中图分类号】 F9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8141(2016)12—1436—05

1、引言

贫困一直是亟待解决的世界性难题。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就将“消灭贫困”写进了《联合国宪章》; 20世纪60年代初, 国外学者开始关注旅游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1999年, 英国发展局提出“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Pro-Poor-Tourism, PPT), 正式将旅游与减贫联系在一起, 成为国际上旅游消除贫困的主要理念、原则和操作模式^[1]; 2002年, 世界旅游组织在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又提出了“消除贫困的可持续旅游”(Sustainable Tourism as all Effective Tool for Eliminating Poverty, ST-EP)。为了解决贫困人口I=I的温饱问题, 我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 1994年提出《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缩小地区差距。为了克服扶贫资金“天女散花, 年年扶贫年年贫”等问题, 2014年我国提出瞄准扶贫对象、重点施策的“精准扶贫”思想。在国家“精准扶贫”理念的影响下, 2014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产业改革若干意见》(国发(2014)31号)首次正式提出了“旅游精准扶贫”的概念, 强调因地、因人、因时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和方案, 实现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2015年5月, 旅游扶贫被列入我国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之一, 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旅游局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560个建档立卡的旅游扶贫试点村。目前, 旅游精准扶贫已经成为我国扶贫攻坚新的政策和措施。

重庆市是国内较早实施旅游扶贫的地区之一, 2011年由重庆市政府扶贫办牵头, 在14个国家级和4个市级贫困县贫困人口集中的大巴山和武陵山片区, 启动了以避暑休闲为主的高山纳凉村乡村旅游扶贫项目^[2], 满足城市居民夏季纳凉避暑的刚性需求。目前, 重庆市已有177个贫困村建设成为乡村旅游接待村, 2014年接待游客680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4亿元, 924个建档立卡贫困户成为纳凉接待户, 户均增加收入3.2万元, 旅游扶贫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

重庆市高山纳凉村旅游扶贫项目从实施之初起, 市县两级的扶贫资金和扶贫力量就直接到村到户。除了建设基础设施以外, 扶贫资金全部用于对接待户的厕所、厨房等改造, 买床、买被子等接待条件的改善和接待户的培训等。此外, 市扶贫办依托市

收稿日期: 2016—10—19; **修订日期:** 2016—11—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连片特困地区旅游扶贫与生态保护耦合机制研究”(编号: 14BSH041)。

第一作者简介: 田翠翠(1991—), 女, 四川江油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区域旅游规划与发展。

通讯作者简介: 田世政(1969—), 男, 重庆市云阳人,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旅游目的地开发与管理、社区旅游等。

级部门、企事业单位和中央驻渝单位等，组织了18个扶贫集团，开展“一对一”帮扶和业务指导，还建立了专门的避暑纳凉网站和热线电话以组织国内外的广大客源。重庆市高山纳凉村项目真正做到了对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其实施理念和途径体现了旅游精准扶贫政策的精髓。重庆市高山纳凉村乡村旅游扶贫项目已实施了5年，比国家正式提出“精准扶贫”和“旅游精准扶贫”早2—3年，可以算是国内旅游精准扶贫的先行者和成功范例，对其案例进行研究，具有全国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目前，旅游扶贫的学术研究已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主要内容涉及扶贫理论、战略模式、扶贫效应、区域扶贫开发实践、问题与对策等^[3-5]，旅游扶贫效应的评估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旅游扶贫效应评估的研究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的视角转换。最初，我国学者多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宏观层面建立指标体系^[6,7]，并运用层次分析法或模糊综合评价法测算区域旅游扶贫综合效应值；或者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8]、DEA法^[9]等分析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则主要从微观视角出发，以贫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期望、经验和感知来认识旅游扶贫的效应^[10,11]，发现社区居民、关键决策者具有不同的感知态度^[12]。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贫困人口受益的微观层面，张伟等^[13]、李佳等^[14]、蒋莉等^[15]通过入户调查，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分析了扶贫效应；郭舒^[16]创建了“产业链跟踪法”来对旅游扶贫进行评估。但在相关研究中，缺乏减贫程度等关键指标，同时也忽略了对贫困人口观念、权力和技能变化的关注。一般而论，学者们多选择热点贫困省市、片区等大尺度空间作为研究对象，对景区、村落等微观单元扶贫效应的实证分析较少^[17]。

在旅游精准扶贫的研究方面，近期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处于旅游精准扶贫的内涵、精准识别^[18]、实践模式^[19]、地区实施途径^[20]等理论方面的探索阶段，尚未发现旅游精准扶贫效应及其评价的文献。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重庆市高山纳凉村的实际，利用层次分析—模糊综合评价法，从贫困人口、贫困家庭、纳凉村社区三个层次的微观视角，建立纳凉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和指数模型，为后期选择典型案例点进行实证研究和结果比较奠定基础，以期对国内外精准扶贫、旅游扶贫、PPT和ST—EP等领域的理论研究有所贡献。

2、评价指标体系

2.1 指标选择原则

根据重庆市高山纳凉村的特点和旅游扶贫效应研究的相关成果，本文遵循以下四个指标构建评价原则：①针对性原则。以重庆市高山纳凉村为特定研究对象，针对性地提出符合纳凉村实际效应的评价指标体系。②继承性原则。在指标体系构建中尽可能做到在理论上有据可循，参考已有文献，选择适用于本研究的评价指标。③代表性原则。衡量旅游扶贫效应的指标既多又杂，繁琐的指标反而会影响评价效果，因此在避免信息遗漏的基础上，尽可能筛选有代表性的关键绩效指标，简化评价工作。④可操作性原则。在选择评价指标时，考虑指标是否可以通过收集数据或居民感知调查等方式获取所需信息，若指标值无法测量，则考虑将该指标转换成同类可获得的指标。

2.2 指标的层级体系

本文利用AHP层次分析法将指标体系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是目标层，为评价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设置为重庆市高山纳凉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第二层是准则层，为基本指标类型，主要有3类；第三层是指标层，各准则层的衡量标准由12个指标组成；第四层为要素层，是各准则层指标的具体表征指标。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和要素层构成评价指标体系集合，具体见表1。

表 1 重庆市高山纳凉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要素层	测度方法
重庆高山纳凉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 (U)	贫困户个体	旅游决策	u_1 : 参与旅游决策程度	居民感知调查
		思想观念	u_2 : 思想观念进步程度	居民感知调查
		技能素质	u_3 : 素质素质改变程度	居民感知调查
		社会地位	u_4 : 社会地位提升程度	居民感知调查
		旅游参与	u_5 : 家庭参与旅游程度	居民感知调查
	贫困家庭	生活水平	u_6 : 家庭人均收入年增长率	(评估当年/实施前人均年收入)/年数
			u_7 : 恩格尔系数减少率	(实施前—实施后)/年数
			u_8 : 人均住房面积增长率	(实施后—实施前)/年数
		人际关系	u_9 : 家庭和谐程度	居民感知调查
			u_{10} : 邻里和谐程度	居民感知调查
		传统文化	u_{11} : 民风民俗继承程度	居民感知调查
			u_{12} : 生活方式改变程度	居民感知调查
	纳凉村社区	减贫程度	u_{13} : 建卡贫困户年均脱贫率	建卡贫困户脱贫率/年数
			u_{14} : 年均返贫率	返贫率/项目实施年数
		产业发展	u_{15} : 旅游收入年均增长率	旅游收入增长率/年数
			u_{16} : 游客接待量年均增长率	旅游接待量增长率/年数
			u_{17} : 就业人数年均增长比率	就业人数增长率/年数
			u_{18} : 旅游设施完善程度	居民感知调查
			u_{19} : 旅游知名度提升程度	居民感知调查
			u_{20} : 其他产业带动程度	居民感知调查
		社会进步	u_{21} : 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居民感知调查
			u_{22} : 居民贫富差距程度	居民感知调查
			u_{23} : 社会治安影响程度	居民感知调查
		环境改变	u_{24} : 环境舒适度	居民感知调查
			u_{25} : 环境改善程度	居民感知调查

2. 3指标的层次与选择

以往对旅游扶贫效应的研究多从宏观层面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三个方面进行评估,田翠翠于2016年4月前往重庆市高山纳凉示范村——黔江区新建村进行了短期调研,通过与接待户的深度交谈等方式,调查了新建村旅游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发展现状、贫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感知和态度等。在调研中,作者认识到从上述三个宏观层面构建本文的评价指标体系针对性不强,认为必须从贫困人口个体、贫困家庭、纳凉村社区三个层面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才符合实际。

贫困户个体:贫困户个体发展情况是旅游精准扶贫效应评估的核心层面^[21],如果贫困人口发展受限,难以得到旅游开发的权利,直接影响到旅游扶贫的效果^[22]。冯旭芳等^[23]对山西省陵川县锡崖沟的调研发现,旅游扶贫为贫困人口提供了收入机会和发展机会,提高了家庭生活水平,居民对旅游业的发展一般都持支持态度。

本文主要从个人发展角度选择贫困户个体层面的旅游扶贫效应评价指标,包括权利实现、思想观念、技能与素质和社会地位四个方面的改变状况:①权利实现。居民参与旅游规划与决策过程可减少对旅游的反情绪和冲突^[24],但在多数情况下,贫困人口都被排除在旅游扶贫决策之外,本文通过参与旅游决策程度来表征贫困人口权利实现情况。②思想观念。贫困人口依赖政府的思想严重,缺乏自觉改变落后面貌和摆脱贫困的主动性^[25],外来文化会无形中影响贫困人口的思想观念,从而加速或减缓旅游业的发展步伐。思想观念的改变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贫困人口的发展状态。③技能与素质。接待意识、服务素质与技能等的提升是保障脱贫巩固的有效方式,也是促进贫困户持续发展的关键。④社会地位。贫困者社会地位的差距会带来社会更深程度的不平衡,破坏社会融合和发展的成果^[26]。重庆市纳凉村扶贫项目的实施增加了贫困人口对自我能力的认可程度,提升了自信心,可利用贫困人口自身对社会地位提高程度的主观评估来衡量该指标。

贫困家庭:家庭是纳凉村的基本社会单元,是旅游精准扶贫的直接帮扶和受益主体,旅游扶贫对贫困家庭的影响深远。文军等^[27]在评估桂林龙胜龙脊景区旅游扶贫的效应时,发现贫困家庭受到的效益明显;宋红娟^[28]根据对海南省5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调查发现,旅游扶贫对农村传统家庭关系、意识形态、家庭结构改变有着巨大的影响。

对贫困家庭旅游扶贫效应的评价重点包括:①旅游参与。贫困户的参与是实现旅游扶贫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36],贫困户参与旅游扶贫可以拉长旅游产业链,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贫困人口获取直接旅游收益的机会,而旅游税收可以反作用于贫困人口,提高社区的医疗卫生水平和基础设施质量^[29]。②生活水平。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贫困家庭参与旅游活动的根本原因,也是促进其积极性的基本动力。本文选择家庭人均收入年增长率、恩格尔系数减少率和人均住房面积增长率三个指标来评估生活水平提高程度。③人际关系。扶贫项目的实施改变了村民之间、村民与游客、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方式,家庭和谐程度和邻里和谐程度是居民主观幸福感、社区社会和谐度的表征指标。④传统文化。旅游扶贫在打破地区贫困局面的同时,会使传统文化变异、扭曲甚至伪文化和文化失忆^[30],造成旅游产品同质化,丧失特色。本文选择民风民俗继承程度和传统生活方式改变程度两个指标评估文化传承情况。

纳凉村社区:社区参与旅游可以让居民获取利益、提高旅游产品质量和保护资源环境^[31],最终实现“经济脱贫”和“观念脱贫”^[32]。马创^[7]发现,通过大量投资发展旅游业,云南仙人洞村在经济、社会、环境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正效应。

本文主要从减贫程度、产业发展、社会进步、环境改变四个方面选择指标:①减贫程度。减贫程度是旅游精准扶贫效应的最直接体现,建卡贫困户年均减少率和年均返贫率可以评估旅减贫效果,也可以反映扶贫实施效率,是目前精准扶贫效应研究中最关注的指标。②产业发展。旅游扶贫本质上是一种产业扶贫^[33],旅游产业的发展会对纳凉村及所在区域形成长远的、动态的影响。旅游收入年均增长率、接待量年均增长率、就业人数年均增长比率、旅游设施完善度、旅游知名度提高程度、其他产业带动程度等指标可较准确地衡量纳凉村社区的产业发展程度。③社会进步。基础设施建设是高山纳凉村扶贫资金主要的投入领域,考虑用基础设施完善程度评价纳凉村水、电、公路、通讯、网络、卫生设施等覆盖情况,以贫富差距程度衡量旅游收益的公平性,用社会治安状况来评估项目实施前后当地社区安全的变化情况。④环境改变。旅游业是典型的资源依托型产业,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旅游开发的依托^[34],特别是以避暑资源为发展基础的高山纳凉村,选择环境舒适度和环境改善程度两个指标来评估当地社区生态环境保护情况。

2. 4指标的获取方式

本文所选取的指标包含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两类,定量指标通过数据收集获取,定性指标则通过调研居民感知获得,具体方式后文介绍。指标体系及其获取方法见表1。

3、评价方法

本文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重庆市高山纳凉村旅游扶贫效应进行评价。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一种基于模糊数学的评价方法,

由于重庆市高山纳凉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层次性，又有部分难以定量的指标，而模糊综合评价法可以根据模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把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可以有效解决非确定性问题，该方法适用于本研究。其具体步骤主要分为以下几方面：

确定评价指标集合U：U={u₁, u₂, …, u_m}。式中，m为指标项目数。根据表1，构建重庆市高山纳凉村旅游精准扶贫综合效应评价指标集U，u_m为第m个综合效应评价指标，m=25。

确定单个指标权重，建立权重集A：A={ a₁, a₂, …, a_n }，n=25，U=∑a_n =1且0≤a_n ≤1。权重反映了各个指标对重庆市高山纳凉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的影响程度。

本文由1名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生导师和3名研究生组成研究小组，采用1—9比例标度法(表2)将指标进行两两比较，获得各指标相对重要性矩阵，然后运用层次分析法权重计算软件Yaahp获取权重(表3)，并通过了一致性检验(表4、表5)。

表 2 1—9 比例标度

量化值	因素比因素
1	两个因素同等重要
3	因素比因素稍微重要
5	因素比因素较强重要
7	因素比因素强烈重要
9	因素比因素极端重要
2,4,6,8	两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表 3 重庆市高山纳凉村旅游精准扶贫综合效应评价指标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要素层	权重		
重庆 高山 纳凉 村旅 游精 准扶 贫效 应 (U)	贫困户 个体 0.5396	旅游决策	0.0864	u_1 :参与旅游决策程度	0.0864	
		思想观念	0.2522	u_2 :思想观念进步程度	0.2522	
		技能素质	0.1496	u_3 :素质素质改变程度	0.1496	
		社会地位	0.0515	u_4 :社会地位提升程度	0.0515	
	贫困 家庭 0.2970	旅游参与	0.0967	u_5 :家庭参与旅游程度	0.0967	
				u_6 :家庭人均收入年增长率	0.0471	
		生活水平	0.1305	u_7 :恩格尔系数减少率	0.0690	
				u_8 :人均住房面积增长率	0.0144	
		人际关系	0.0280	u_9 :家庭和谐程度	0.0205	
				u_{10} :邻里和谐程度	0.0075	
		传统文化	0.0419	u_{11} :民风民俗继承程度	0.0101	
				u_{12} :生活方式改变程度	0.0318	
		纳凉村 社区 0.1634	减贫程度	0.0651	u_{13} :建卡贫困户年均脱贫率	0.0319
					u_{14} :年均返贫率	0.0302
				u_{15} :旅游收入年均增长率	0.0137	
				u_{16} :游客接待量年均增长率	0.0247	
	产业发展		0.0561	u_{17} :就业人数年均增长率	0.0049	
				u_{18} :旅游设施完善程度	0.0028	
				u_{19} :旅游知名度提升程度	0.0018	
				u_{20} :其他产业带动程度	0.0082	
				u_{21} :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0.0107	
	社会进步		0.0165	u_{22} :居民贫富差距程度	0.0021	
				u_{23} :社会治安影响程度	0.0037	
						u_{24} :环境舒适度
	环境改变		0.0257	u_{25} :环境改善程度	0.0065	

表 4 准则层指标权重及其一致性检验

指标	贫困户个体	纳凉村社区	纳凉村所在区域	W_i
贫困户个体	1	2	3	0.2970
贫困家庭	1/2	1	2	0.5396
纳凉村社区	1/3	1/2	1	0.1634

$\lambda_{\max} = 3.0092$
 $CR = 0.0088 < 0.1$

表 5 要素层指标权重一致性检验(以贫困户个体层面为例)

指标	u_1	u_2	u_3	u_4	w_i	
u_1	1	1/2	2	1/3	0.1601	
u_2	3	2	4	1	0.4673	
u_3	2	1	3	1/2	0.2772	$\lambda_{\max} = 4.0310$
u_4	1/2	1/3	1	1/4	0.0954	$CR = 0.016 < 0.1$

建立指标评判集合 V : $V_1 = \{v_1, v_2, \dots, v_n\}$ 。式中, V_1 为第一个指标的事实评判集合; q 为事实评判的项目数; v_q 为第

q 个答案的隶属度, $v_1 + v_2 + v_q = 1$, 则评价指标体系的综合隶属度为:

$$\begin{Bmatrix} v_{11} & v_{12} & \cdots & v_{1q} \\ v_{21} & v_{22} & \cdots & v_{2q} \\ \vdots & & & \vdots \\ v_{n1} & v_{n2} & \cdots & v_{nq} \end{Bmatrix}$$

式中, v_{nq} 代表第 n 个指标的第 q 个答案的隶属度。本文以{最大, 比较大, 一般, 比较小, 最小}作为定性指标的事实评判集合。经过案例地居民感知调研后的整理数据, 得到重庆市高山纳凉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评价指标体系的事实评判隶属度。本研究中有部分指标属于定量数据, 需要根据重庆市高山纳凉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实际发展情况建立模糊评判标准。本文建立的具体评价标准见表6。

表 6 定量指标评判标准(建议值)

指标	评判标准(%)				
	最小	比较小	一般	比较大	最大
家庭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	< 20	20—40	40—60	60—80	> 80
建卡贫困户年均脱贫比率	< 20	2—4	4—6	6—8	> 8
恩格尔系数减少率	< 5	5—20	20—35	35—50	> 50
人均住房面积增长率	< 20	20—40	40—60	60—80	> 80
年均返贫比率	< 2	2—4	2—6	6—8	> 8
就业人数年均增长率	< 5	5—7	7—9	9—11	> 11
旅游收入年均增长率	< 10	10—20	20—30	30—40	> 40
游客接待量年均增长率	< 10	10—20	20—30	30—40	> 40

计算综合隶属度向量W: $W=A*V$ 。

计算综合效应指数: 若评价等级分值向量 $(R)_{1*q}$, 那么其综合效应指数为: $\mu = W * R^T$ 。本文参考包军军^[35]建立的旅游扶贫效应等级及赋值标准, 将重庆市高山纳凉村精准扶贫效应划分为5个评价等级, 赋值见表7。

表 7 重庆高山纳凉村精准扶贫效应评价等级

R 值	$0 \leq R \leq 1$	$1 \leq R \leq 2$	$2 \leq R \leq 3$	$3 \leq R \leq 4$	$4 < R$
等级	很弱	较弱	中等	较强	很强

本研究中具体的评价等级向量为 $R=(1, 2, 2, 4, 5)$, 最终可求得综合评价效应 μ 值。同理, 可分别计算准则层相应的综合评价效应值。

4、结论与讨论

本文提出了重庆市高山纳凉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指数模型, 为实证研究和政策研究奠定了基础。后续研究拟选择重庆市渝东南生态保育发展区的黔江新建村、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的丰都横梁村、都市功能拓展区的南川永安村为典型案例点, 通过调查与实际评估测度, 再通过对比3个纳凉村各个综合效应值、准则层效应值和指标层效应值, 分析这些地区实施旅游精准扶贫的差异与实际绩效之间的关系, 为重庆市高山纳凉村精准扶贫政策的优化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为其他地区旅游精准扶贫工作的推进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参考文献:

[1]黄华芝, 廖茂, 吴信值. 国内外旅游扶贫研究述评[J].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4, (4): 5—8.

[2]重庆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乡村旅游扶贫成渝都新名片[J]. 中国扶贫, 2015, (16): 54—57.

[3]李会琴, 侯林春, 杨树旺, 等. 国外旅游扶贫研究进展[J]. 人文地理, 2015. 3(1): 26—32.

[4]丁焕峰. 国内旅游扶贫研究述评[J]. 旅游学刊, 2004, 19(3): 32—36.

[5]曾本祥. 中国旅游扶贫研究综述[J]. 旅游学刊, 2006. 21(2): 89—94.

[6]肖佑兴, 明庆忠: 旅游综合效应评价的一种方法——以白水台为例[J]. 生态学杂志, 2003, 22(6): 152—156.

[7]马创. 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投资的扶贫效应研究——以云南丘北县仙人洞村为例[J]. 云南电大学报, 2010, 12(2): 90—92.

[8]杨建春, 肖小虹. 贵州旅游扶贫效应动态分析[J]. 商业研究, 2011, (7): 212—216.

[9]龙祖坤, 杜倩文, 周婷. 武陵山区旅游扶贫效率的时间演进与空间分异[J]. 经济地理, 2015, 35(10): 210—217.

-
- [10]Seheyvens R, Russell M. Tourism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Fiji: Comparing the Impacts of Small—and Large-scale Tourism Enterprises[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2, 20(3): 1—20.
- [11]Akyeampong O A. Pro—poor Tourism: Residents’ Expectations, Experiences and Perceptions in the Kakum National Park Area of Ghana[1].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1, 19(2): 197—213.
- [12]Muganda M, Sahli M, Snfith KA, et al. Tourism’ s Contribution to Poverty Alleviation: A Community Perspective from Tanzania[J]. Development Southern Africa. 2010. 27(5): 629—646.
- [13]张伟, 张建春, 魏鸿雁. 基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扶贫效应评估——以安徽省铜锣寨风景区为例[J]. 旅游学刊, 2005, 20(5): 43—49.
- [14]李佳, 钟林生, 成升魁. 民族贫困地区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和参与行为研究——以青海省三江源地区为例[J]. 旅游学刊, 2009. 24(8): 71—76.
- [15]蒋莉, 黄静波. 罗霄山区旅游扶贫效应的居民感知与态度研究——以湖南汝城国家森林公园九龙江地区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5, 34(4): 99—104.
- [16]郭舒. 基于产业链视角的旅游扶贫效应研究方法[J]. 旅游学刊. 2015, 30(11): 31—39.
- [17]黄国庆. 国内旅游扶贫研究综述[J]. 安徽农业科学, 2013, 41(13): 821—5824.
- [18]邓小海, 曾亮, 罗明义. 精准扶贫背景下旅游扶贫精准识别研究[J]. 生态经济. 2015, 31(4): 94—98.
- [19]桂拉旦, 唐唯. 文旅融合型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研究——以广东林寨古村落为例[J]. 西北人口, 2016. 37(2): 64—68.
- [20]何茜灵, 宋亮凯. 旅游扶贫试点村背景下旅游精准扶贫调查研究——以葫芦岛市建昌县玉带湾村为例[J].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2015, (6): 81—83.
- [21]刘筏筏. 旅游扶贫的经济风险及应对策略探析[J]. 商业经济, 2006. (12): 96—97.
- [22]王永莉. 旅游扶贫中贫困人口的受益机制研究——以四川民族地区为例[J]. 经济体制改革, 2007. (4): 92—96.
- [23]冯旭芳, 徐敏聪, 王红. 基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扶贫效应分析——以锡崖沟为例[J]. 生产力研究, 2011, (5): 91—92.
- [24]Murphy P. Tourism: A Community Approach[M]. New York: Methuen. 1986.
- [25]叶俊. 基于社区参与的大别山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研究[J]. 湖北农业科学, 2015, 54(7): 1766—1769.
- [26]石奎. 贫困阶层能力提升的社会政策分析[J]. 河南社会科学, 2010, 18(4): 112—114.

-
- [27]文军, 李星群. 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研究——以桂林龙胜龙脊景区为例[J]. 广西民族研究, 2008. (4): 195—202.
- [28]宋红娟. 海南旅游扶贫区家庭关系变迁研究[J]. 特区经济, 2014, (10): 209—211.
- [29]龙梅, 张扬. 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扶贫效应研究[J]. 农业经济, 2014, (5): 48—50.
- [30]Rotich D. An Analysis of the Challenges Facing Cult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Kenya[J]. Research on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2012, 2(10): 214—221.
- [31]刘筏筏. 旅游扶贫的社会文化风险及防范对策[J].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9(2): 173—176.
- [32]邱云美. 社区参与是实现旅游扶贫目标的有效途径[J]. 农村经济. 2004, (12): 43—45.
- [33]方硕, 何鑫鹏. 河池国家旅游扶贫试验区旅游扶贫模式研究[J]. 旅游纵览月刊, 2015, (1): 143—145.
- [34]李刚, 徐虹. 影响我国可持续旅游扶贫效益的因子分析[J]. 旅游学刊, 2006, 21(9): 64—69.
- [35]包军军. 旅游扶贫效应研究[D].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5.